

批判右派分子李景汉文集

本校内部使用

說 明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是我校部分青年教師和學生在去年八、九月間我校科學研究躍進運動中所完成的一部分學術批判作品。這些論文對右派分子李景漢的社會調查及其有關社會調查等問題的謬論，做了比較全面的清算。由於這些作品都是在短期內以突擊的方式寫出的，其中批判不夠深刻乃至欠妥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批評和指正。

1959年1月

目 錄

批判李景汉的社会調查·····	統計系师生唐垠等集体写作··	1
李景汉北京郊区农村調查的对証与批判·····	若吉坐··	31
对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 的批判·····	定县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干部調查組··	51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調查的实用主义方法··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11
駁斥李景汉关于“平民教育”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35
駁斥李景汉关于社会学和社会的謬論·····	哲学系教师刘炯忠··	153

批判李景汉的社会調查

統計系師生唐垠等集体寫作

一、李景汉如何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李景汉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在党整风期間，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口号下，企圖复辟資产階級社会学，用它来攻击馬列主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以达到其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的陰謀的目的，这一陰謀早已被我們徹底揭穿，徹底打垮了。

李景汉这样猖狂地向我們进攻，除了为其階級本能所驅使外，还因为他自認為在学术上有些本錢，想和我們來較量一下。

李景汉是学社会学的。罗隆基說，“关于社会学問題”去找李景汉。其实李景汉在这方面的本錢是少得可憐的。李景汉的著作大多数是調查報告及有关社会調查方面的文章。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学的理論和观点是极不成体系的，相互矛盾的，即使在同一篇文章中、同一段話中也是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馬嘴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有不同的派別（本質上都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但李景汉自己却說不上他是屬於那一派來。我們先不以真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只就資产階級的科學来看，他們的同行也是看不起他的。只是为了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目的才把他捧出來。李景汉的全部本錢就是搞了一些調查，写了几篇調查報告及文章。这样李景汉就以調查專家自居了，好像中国別無他人，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就非得請这位“專家”出場不可了！

李景汉在社会学方面主要攻击我們三点：

1. 从理論上攻击我們“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則，干巴巴的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的說服力”，一下給換了出來，也就不好再鑽

进去了(“李景汉先生訪問記”,載“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还有与实际生活大有关系的重要問題沒有研究”,这是“空白”。

2.攻击我們不重視社会調查,說我們的統計調查是“望遠鏡式的”,只能“鳥瞰式”地看到全国社会現象的全貌,只能了解个“概括情况”,并且在“实施中”又往往“徒具形式”;是空洞的,“見林而不見木”的,也还有不少“空白”(1957年10月4日李景汉在“新建設”編輯部“关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座談会上的发言)。

3.攻击我們在組織上“过去几年……沒有一个統計調查的正式組織”,沒有請李景汉之流“有經驗的專家”参加,沒有“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統計技术与理論”(1957年5月27日李景汉在国家統計局京津部分經济学、統計学教授座談会上的发言,載“統計工作”1957年第12期)。

李景汉一面攻击我們,一面宣揚他們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是“显微鏡式的、X光式的”,是“細致而深入”的,“向来就是……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真实面貌”的。而“要解决我国多种多样的社会經济問題”就非請他們来調查不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和内容丰富与充实起来”也非請他們不可,甚至我国“人民内部相互間种种矛盾問題”也需要由他們来研究解决了!

李景汉这种攻击是惡意的誣蔑,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1.李景汉竟把事实的黑白顛倒到如此程度,好像如人民内部矛盾問題,不是我們毛主席、共产党人、馬列主义者提出来的,不是我們在研究与解决这些問題,而倒是資产階級社会学者們“本来就是研究这些問題”的!資产階級社会学是根本不提“矛盾”的,而今天也要来研究“矛盾”,这豈不可笑?

好像我們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資产階級社会学,倒要由他們来“补充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請問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什么空白需要由反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补充与丰富”呢?

李景汉之流所提出的家庭、妇女、婚姻、敬老等問題,也根本不是什么空白,不仅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在这些問題上有所論述,而且这些

問題在我国已經得到了解决。婚姻法的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明。事实上不是我們沒有研究解决这些問題，而是李景汉在企圖破坏这些問題的正确解决。李景汉在解放后攻击合作社的五保制度不正是很好的証明嗎？

2. 李景汉誣蔑我們不重視社会調查，如指的是資產階級社会調查，則我們不但不重視，而且是根本否定的。但我們絕不是不重視馬列主义的社会調查。

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义。它从来就与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我們在任何工作中都強調調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以免犯主观主义的錯誤。所以說从理論上来看馬克思主义者是一貫重視社会調查的。我們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經常以“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发言权”，“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使我們具有对中国問題的最基本知識”等指示来教导我們。从实际来看，我們也切实执行了这个指示。

中国資產階級学者虽然也做过一些片断的調查，但就其数量及質量上来看，都沒有給我們留下关于中国社会情况的起碼材料，这种情况毛澤东同志早就做了分析性的結論：“中国幼稚的資產階級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样，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农村調查”的序言）毛主席就曾亲身作过不少的調查研究，而已发表的“兴国調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对推动我国的革命工作均起了重要作用。他运用馬列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調查研究，在理論上、方法上都給我們作出了典范。

中共中央在1942年又曾專門作过关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中不仅規定各級党的机关建立調查研究機構，并且要動員全党、全軍、政府各机关及全体同志“都进行調查研究工作”。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老解放区我們作过無數的調查研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了更大的发展。

資產階級学者吹嘘他們作了多少多少調查，但这只不过是少数

“專家們”作的有限数量而已。我們動員廣大群眾、廣大幹部來進行，把調查研究作為我們的一種工作方法，貫徹到日常工作中去，這就絕非他們少數人出幾本調查報告所能比擬的了。李景漢硬說我們“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者”不重視社會調查，這本身就是根本不懂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表現，也是閉眼不看事實的惡意誣蔑。

3. 說我們沒有正式的統計調查組織，這簡直是與美帝國主義硬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一樣，李景漢竟然把我們全國上萬人組織起來的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統計組織也一筆抹煞掉，說是根本不存在。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李景漢這種惡毒攻擊的目的在於妄圖：

- 一、在理論上以資產階級社會學代替歷史唯物主義；
- 二、在統計上以資產階級社會調查代替馬列主義的統計；
- 三、在組織上以資產階級的專家來全部代替馬列主義者及共產黨人。

這樣，關於國家的政策、措施、計劃等都得根據他們的意圖來辦事，從而就完全可以達到其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目的了！

可見這根本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社會調查是一種工具，資產階級用來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用來為無產階級服務。

進行社會調查必須有一定的立場、觀點、方法。根據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所進行的調查，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調查，才能夠正確地反映客觀現實，才是科學的調查。

資產階級學者總是想把这个根本的立場、觀點問題掩蓋起來，而把社會調查說成是純客觀的、純方法的、純技術的東西，這無非是怕人揭穿其資產階級的本來面目而作的虛偽宣傳而已。

立場、觀點、方法是鑒別真偽科學的試劑，是鑒別鮮花與毒草的試劑。李景漢怕在人民面前暴露其丑惡面貌，於是就盡量化裝一番，把自己說成本來就是素朴的“唯物主義者”，現在更“已經成為真正的

唯物主义者”了；本来就是“最了解工农的，具有工农感情的”，現在又已經“端正了立場”了。但毒草是不会因它自封为鮮花就变成鮮花，假面具总是騙不了人的。

二、李景汉站在什么立場上进行調查

在階級社会中，人总是屬於一定的階級的，他們为本階級的利益服务。人們在觀察一切事物时也总是站在一定階級的立場上去看問題。

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們就分为互相对立的階級集团——統治階級与被統治階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新生的階級必然会推翻其統治階級而居于統治地位。历史发展規律告訴我們，資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有階級的社会，無产階級起来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后，將建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階級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一切剝削階級都將走向灭亡的道路。但垂死的、沒落的階級是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剝削階級为了保持其統治地位，总是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揭露事物的本質，总是要掩盖階級矛盾的存在。为資產階級服务的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資產階級社会学者李景汉与其他人一样，不敢把自己的階級立場明显地暴露在人們的面前，总是想把自己的真正立場掩盖起来，总是向人表白和喧嚷其調查是純“客觀”的，超階級的，“站在一切主义之外”的，是“完全反映客觀现实”的。李景汉作賊心虛地說为了“避免主觀的偏見”，要“多引用統計数字，少用叙述”，为此目的“虽失之枯燥，亦在所不計”。但客觀存在的事实是李景汉“表白”也表白不清的，人們不只听其口头上的“表白”，还要看他的實質。李景汉的調查如果真正是“客觀”的又有什么必要避免偏見呢？既無偏見又为什么不敢叙述呢？可見本来是歪曲事实的偏見，怕被人揭穿才先放出“客觀”这一烟幕。誰都知道这种作法本身就正是其資產階級階級性的表現。

事實證明，李景漢是站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上，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李景漢曾經寫過“中國人的普通毛病”一文，該文發表於1926年“現代評論”上。在這篇文章中李景漢極盡誣蔑中國人民之能事，把中國人民描寫成毫無數字觀念、沒有科學頭腦、馬馬虎虎、愚昧無知的蠢夫，並且把這種毛病歸結為“差不多成了第二天性的習慣”，說“科學決不是‘大概齊’的人們所能發明和改進的，就是連管理汽車、火車與各種無情的機器，恐怕也不見得妥當”。

請看這種濫調與帝國主義的“種族論”有什麼區別呢？中國這種“劣等民族”不就非請帝國主義來統治不可了嗎？

這篇文章很得到賣國求榮的反動統治者的嘉獎而被編入古今名文八百篇之內。

李景漢宣稱這是從他了解中國社會“真相的”“實地社會調查”中得到的體會，從這體會中總結出來的“真相”。而我們卻從李景漢為潘光旦所著的反動透頂的“人文生物學論叢”所寫的序言中發現了李景漢的真相。

原來有一個帝國主義分子明恩溥曾在中国一連“服務”了五十四年，這個帝國主義分子早就寫過一本污蔑中國人民的“中國人的特性”一書。在書中他污蔑中國人有“無惻隱之心”、“言而無信”、“爾詐我虞”等十五條“特性”。明氏本人及這本書受到了美、德、日等帝國主義的重視，該書被稱為“佳作”。

李景漢早在初中上學時就讀過其日譯本。我們只引李景漢在前敘的序言中一段話，就可見其如何反動了！他說：“我記得書中的許多頁的空白處，有不少鉛筆的批評，其中大部分是別的讀者在讀時發生的反感，還恍惚的記得有‘胡說’和‘放他娘的屁’等類的話”。

李景漢當時讀了譯文，還多少有些中國人的血性，“大不以為然”，而發作几声“豈有此理”。但到後來有“不少機會得親聆明氏的講演”，就把這個帝國主義分子變成了一個使人（李景漢）“敬而愛之的長者了”。於是李景漢就拜倒在這位“觀察精密，獨具只眼”的帝國主

义分子之膝下了！由此李景汉就“客觀的”（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冷靜的”（丧失了仅存在的一点中国人的血性！）把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說成是“同情人类”、“敬重中国”、“重事实”、“爱真理”的至聖天尊了。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民的十五条特性中有一条就是“不求准确”，他把中国人描写为連講自己的身高时都不知道把腦袋包括在內的“蠢夫”，并为“我們的化学試驗担心”。李景汉用其“实地”調查反复地証明他的論点之正确，并发展了他的学說，說中国人民甚至連管理汽車、火車都恐怕“不妥当”了！

旧中国的貧穷愚昧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当我们斬断其侵略之魔爪，把他們赶出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不但能管理汽車、火車，而且能自己制造質量优良的汽車、火車、飞机，并且能掌握尖端科学原子能。現在不用他們为我們“担心”了，而是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他們自己的命运担心了！

原来所謂“客觀”者，不过是帝国主义立場的代名詞，所謂实地調查了解的“真相”，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信口雌黃”，而用李景汉实地調查“体会”的幌子再版了一番而已！

事实也証明李景汉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把旧中国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用“調查”的材料歪曲为“耕者有其田”，并极力为地主剝削压迫农民进行辯护，以开脫其罪行。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調查”中說：“本地区地主与佃戶之間的关系很好，沒有地主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这大半由于双方有同族或近鄰或同乡之誼，平日感情都很融洽，每遇婚丧等事皆互相往来庆吊。因此沒有听见有佃农抗租或霸种和地主欺詐或威吓的事情发生”。事实如何呢？只按該調查报告中所記，地主对农民的剝削就是很重的，“……錢租与粮租外，尚有农产分租法，就是佃农耕种地主之田地，待各种农产收获后，按比例兩方分配。有对分租法，有四六分租法”（地主分六成，佃农分四成）。“还有一种办法，即雇工佃种法。……庄稼收获后，若为細粮如麦子則地主得十分之八，佃农得十分之二，若为平常粗粮如谷子則地主得十分之六，佃农得十分之四”。看吧，在这种剝削之下，佃戶与地主却相处得

关系頗好，沒有地主無理压迫佃农的事情！如果不是李景汉为地主阶级开脱罪行，有意抹煞事实，誰能相信这不是瞪着眼睛說瞎話而是实地調查呢？！

事实也証明李景汉是高利貸者的代言人。高利貸者对农民的借款索取高得使人無力偿还的利息，而且要有房、地产作为抵押。李景汉一方面說在負債人無力还債时要將其“不多”的“产业”加以“沒收”，却同时用同样极不高明的手法在同一段的文字中說：“債主对于負債人到期不能偿还时，其态度大半頗为和平”。李景汉反而把高利貸者的猙獰面貌描繪成“殷实的农人，商人或錢局”（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調查”）。

事实还証明李景汉是资产阶级的辯護士。“数十年来北京生活程度的比較”是他于三十二年前发表在“現代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列出了表格，然后又用文字重复叙述了一遍，以显示他的統計專家的“本領”，用实际工資 = $\frac{\text{工資指数}}{\text{生活費指数}}$ 的公式来分析問題

（很可惜，这位不高明的專家把公式也給弄錯了。这里的实际工資应改为实际工資指数才对）。从分析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从历年实际工資的变迁看来北京的工人們似乎有他們习以为常的生活程度。若物价、工資和兌換（应为兌換率）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标准，他們就不打算增加工資，再者，雇主和工人同在一个行会，虽然有时物价的低落使实际工資提高，可是沒有一部分人可以出来將工資減低（着重点是我們加的，李景汉明显地在为雇主叫冤）。若物价的增高使实际工資降到工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之下，行会一定要召集會議，討論增高工資的。这是因为不但工人們要自动的維持他們的生活，雇主和工人們寻常彼此很熟悉，所以他們也和工人們表同情的。”

李景汉以最关心工人生活，最了解工人情况而自詡，这里却把工人“每月平均十元錢”（这十元錢是帶問号的），“不过能維持他們粗衣粗食的不冷（？）不餓（？）的生活”說成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个結論，既然工人們“习以为常”，就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

善了，工人也就大可不必进行什么斗争了。何况在物价低落时，实际工资还有所“增高”，而在物价上涨时，又有“仁慈的”雇主主动地同情工人去“提高”工资呢？一片“和平”、“平等”、“友爱”社会的美景被李景汉以“实地调查”来的“真实”情况描绘出来了。不仅如此，李景汉还认为工人太不懂人情，工人占了雇主的便宜，而雇主是又大方又吃亏了！因为在物价低落时，没有人去降低工资。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真相大白，原来所谓站在工农立场上“具有工农感情”的李景汉不过是雇主的代言人。

每月平均十元钱=不冷不饿的最低生活水平=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明明是雇主剥削工人，经李景汉一调查就变成了雇主宁愿吃着亏去照顾工人生活。本来是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情况，被李景汉一调查就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平了。难怪乎李景汉认为调查决定一切，一调查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李景汉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种调查对中国人民会有什么用处呢？对科学会有什么价值呢？不难想像，为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服务的打着学者招牌的御用文人的社会调查是必然反人民、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否认社会发展规律并从主观愿望出发，企图长期保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来阻挠中国革命。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之一就是豢养一批丧尽了民族天良的走狗，打着学者的招牌，以搞调查为名，来替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为中国反动统治者服务。李景汉就是他们的御用文人之一。所以李景汉一再强调其社会调查之重要不是没有来由的。

李景汉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宣传其社会调查之重要性，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甚至像“旅行”杂志这样的刊物也不放过。

李景汉说：“若要真的找出一条救国的出路，真的要获得有相当

把握的建設國家之適當辦法或步驟，必先真的了解中國本身的內容，若要真的透徹的了解中國社會的真相，必先从調查研究事實入手”（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

看吧，李景漢是個“愛國者”，要“救中國”，而其救法就是“調查”，真可謂之調查救國論者。於是李景漢等便“熱心推行社會調查運動”並被稱為這一運動中的一員“勇將”了（見陶孟和為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寫的序）。

當時國內封建軍閥混戰，並勾結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把中國當成一塊肉，爭而割食。全國人民紛紛起來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中。在此民族危機之時，要救國本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好事。誰要救國就應該參加到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行列中去打先鋒。但調查救國論者卻与众不同。李景漢認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不過是一個“時髦的口號”，為了轉移鬥爭的目標，李景漢故意歪曲這個鬥爭並把它同派系鬥爭混淆起來說成為：“不順某人之眼或不合某派之心”的為私人利益的派系鬥爭；同時給真正愛國者加上了“禍國殃民”的罪名，並說：“如此亂打亂倒不大要緊，老百姓夾在打與倒的中間可就大受其罪了”（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李景漢認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是一種“破壞”行為。調查救國論者搬出了社會調查的法寶說：“社會調查的工作不是破壞而是建設，只要調查出來何者確應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的步驟如何，打倒以後拿甚麼較好的來替代，否則先慢着打倒”（同上）。

當人民群眾已經動員起來，矛頭指向帝國主義，眼看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將被清掃出去了，這時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奴才們慌了手脚，大喊“且慢”，“且慢”，待我先來“調查”一下，是否需要“打倒”，並威嚇說：“再要打倒就有亡國滅種之危險”（同上）。

李景漢既然是要去調查，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李景漢調查了些什麼吧！

如前所述，李景漢的調查根本沒有接觸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李景漢調查的結果是地主、高利貸者對農民很好，資本家是工人的恩

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則一字不提。李景汉認為問題在于穷、愚、弱、私，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穷。那么穷的問題又如何解决呢？我們先看他在“北京拉車夫的苦工”一文的解答。

在这篇文章中，李景汉除了將調查材料中关于人力車夫的穷苦生活情况重复的叙述了一番之外，沒有解决任何問題，既沒有找出造成穷苦的真正原因，也沒有指出解决問題的出路。他的結論是：“从北京拉車的苦工这般情况看来，無怪今日中国的乞丐，丘八和土匪要盛行，这就是我国無产阶级的真相，我深盼談什么主义講什么政策的人們对于此种真相多少用心去調查，多去研究一番。須要根据事实，对症下药。不能見样学样，削足适履。大家先来量脚，好預备做舒服的鞋子，这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李景汉在这里以無产阶级的“恩主”姿态出現，把“談什么主义”的人們大罵了一陣之后，还是強調“調查”。

李景汉像是为了解救無产阶级的穷苦而去調查其实际情况，但調查的結果找出来所以穷苦的原因还是“穷苦”！不是嗎？从人力車夫的生活看到中国之穷，因为穷，乞丐，丘八，土匪就多。那么他的邏輯就是再去調查乞丐、丘八，从那又得出結論还是穷。李景汉的办法是：穷——調查，調查——穷，那么就是穷，穷，穷；調查，調查，再調查。难道这样就可以救国了？！

李景汉的办法就是要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在封建主义束縛下忍受半死不活的生活。李景汉的調調是：“吃粗粮固然不好，犹胜于無粮餓死，破屋固然不好，而犹胜于無屋冻死，好食物有，准备之后，再棄粗粮，好屋建筑之后再折破屋。否則非弄成鷄飞蛋打，国困民穷，甚至亡国灭种不可。”（李景汉：“实地社会調查方法”）

以后李景汉也曾附和晏阳初的四大教育論点，贊成什么以生計教育来救穷，以文化教育来救愚，以衛生教育来救弱，以公民教育来救私；也曾提出什么节育、福民、增加生产等办法来救穷；又曾提出什么资产阶级的合作社来作为中国农村的出路。但在任何时候，李景汉的救国出路都是不要打倒封建势力，也不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都是力

求不从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充其量不过是作一些微小的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麻痺無產階級的鬥爭意志而已。

由此可見，李景漢的調查是用來反對革命，反對馬列主義的。他們搞調查運動是為了抵制我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轉移人們的鬥爭目標，麻痺人們的鬥爭意志的。

李景漢的這一手法是與臭名遠揚的胡適的反動觀點一致的。胡適要少談些主義，李景漢就大罵“談什麼主義的人”，就反對“打倒”。胡適要多談些問題，李景漢就去調查人力車夫之窮，調查農村之窮、愚、弱、私。胡適裝着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而抹煞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裝着研究婦女纏足問題而不要觸動封建主義的經濟制度。李景漢也一模一樣地去調查人力車夫的窮，婦女的裹腳布有多長，婆媳關係，一個人一年洗幾次澡等問題而抹煞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的壓迫等根本問題。

李景漢是老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帝國主義忠實走狗。李景漢真正要救的不是中國而是帝國主義。李景漢的社會調查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這一點李景漢自己也不否認。他在“旅行”雜誌上發表的“學術的旅行”一文中說“英國之所以有很多殖民地就是因為人們在旅行時發現之後報告國人而獲得的”。李景漢就是本着這個宗旨來進行社會調查以為帝國主義效勞。

李景漢從美國留學回國後就專門充當帝國主義文化特務甘博的助手，並受他的僱傭來進行調查。以後他在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在晏陽初舉办的定縣實驗區進行調查，都是按照帝國主義的要求進行的。

資產階級社會學從其被搬入中國的第一天起就是用來反對中國革命的，反對馬列主義的。李景漢就是這樣一員反革命的“勇將”。

這個老牌反革命的“勇將”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當然是不甘心的，總是希望有一天他的主子——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還會卷土重來，總是念念不忘地想干他的老行當。因此人民給他悔罪的機會，他却不是真正低頭認罪，而是假檢討企圖蒙混過關，不是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而是用“配眼鏡”的辦法來學習馬列主義，

以便披上馬列主义外衣，販賣其資產階級的黻爛私貨。所以李景漢在解放后繼續利用其社會調查來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是根本不足為奇的。

解放后他所作的京郊挂甲屯調查充分証明了李景漢反動成性。他深知黨在农村的根本政策是實現農業合作化，要想使資本主義復辟并從根本上打垮社會主義就必須首先反對合作化，因此他就不遺余力地攻擊合作化政策，捏造事實，說合作化“不自由”，惡意誣蔑說：“昔日把人當牛馬是一定不對的，而今日却有時把人當拖拉機用一用”（李景漢：“北京郊區農民生活的過去和現在”）。在李景漢的筆下，解放后實現了高級合作化的農村是一幅多么悲慘的圖畫！但是誰不知道只有在解放后農民群眾才真正當家作主，成了社會和自然的主人，才永遠擺脫了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生活，并且才有可能并實際使用了拖拉機耕地。李景漢却故意顛倒黑白，說成是什麼“把人當拖拉機用”。為了達到他反社會主義的可耻目的，李景漢竟不擇手段到如此地步！

不仅如此，他还故意混淆是非，籠統地說：“有的社員要搞点兒家庭副業，說不定會招出批評、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或自發的帽子，被認為有碍于集体的發展”（同上）。我們說，在当时情況下，只要這種家庭副業宜于分散經營，并且不妨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發展，對國家和人民生活都有利，無論國家或合作社都是大力支持的。但是社員如想利用所謂的“家庭副業”來進行投機倒把，發展資本主義，則是不能允許的，应当而且必然會“招出批評、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或自發的帽子（這頂帽子是很合適的），被認為有碍于集体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如對通過所謂的“家庭副業”來發展資本主義的社員不進行公開的批評，不展開激烈的鬥爭，則必然會影響其他社員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妨碍合作社事業的存在、發展和鞏固，從而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巨大的危害。李景漢不分青紅皂白，混淆是非，然后據此要求“今后對於零星副業(?)不妨多鼓勵社員們在自己家內經營”（同上），就是要求不管是否妨碍集

体事业的发展，都听任社員們自由經營所謂的“家庭副業”，放任資本主義自由氾濫。李景漢利用他的顛倒黑白的調查，堅決引導農民抵抗社會主義而重新去走資本主義老路的陰謀不是暴露的很明顯了嗎？

李景漢深知土地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要實現農業合作化，就要變土地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所以他就在自留地問題上大做反革命文章。首先他惡意歪曲事實說，“農家的自留地是少到不到一分地，甚至連一點兒也沒有的”（同上），然後主張自留地可“酌量多給一點兒，這對於滿足社員的需要和情緒是不無小補的”（同上）。如果照李景漢的主張做去，社員的收入主要依靠自留地，那麼合作社又怎麼能夠存在和巩固呢？挂甲屯的農民群眾說得好：“我們入社主要靠土地，每人多留點自留地，那社不就垮了”？李景漢就是這樣運用他歪曲事實的社會調查，企圖使合作社名存實亡，引誘人們繼續去走單干的資本主義的道路。

李景漢也清楚地知道對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李景漢，也就惡毒地攻擊統購統銷政策。在李景漢的筆下，農村的情況是：“有幾種日常用品的缺乏，使農婦們一提起來就皺眉頭。例如不易隨時能夠買到擦底子所需要的麻，致使不少人家做不出家里人够用的鞋穿。”（同上）可是根據我們的調查，明明是農民的生活改善了，有錢買球鞋穿，而且球鞋比布鞋耐穿，適用，所以農民穿家里自制的布鞋就減少了。農民們也都反映合作社供應的麻够用了。李景漢故意把農民生活的改善顛倒為“做不出够用的鞋穿”，只能更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反革命本性。

李景漢深知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基礎，所以他也不遺余力地挑撥工農關係，精心挑選了如下一些煽動性的詞句：“誰誰家的小伙子在工廠找到工作啦，回家的時候，衣裳穿的可漂亮啦。還有誰誰家的女孩子也進了工廠，頭回看見穿花衣裳，現在連髮也燙